

我国文科教材建设的历史与未来

阎志坚 杨志坚

文科教材建设是文科教育事业的一项基本建设。教材是教育的先决条件,教育的内容必须通过教材传授给受教育者;教材建设工作的好坏,往往直接影响教学质量和人才的培养。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各种文化知识乃至民族精神结晶的文科教材,更是培养新型的社会管理、理论研究和文化宣传人才的关键。出色的文科教材,不但可以成为那些希求研究历史、探索社会、开拓未来者的“金钥匙”,同时也从根本上体现出时代、社会对受教育者的要求。

为了加深对文科教材及其建设工作的理解和认识,本文将试图以建国38年来文科教材建设的历史为基点,结合我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对未来文科教材建设的发展作点探讨。

历史的回顾

我国文科教材建设工作是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而开始,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发展的,正如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样,我国的文科教材建设工作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

新中国的诞生,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出现百废待兴的局面,教育也不例外。然而,要在旧教育制度的废墟上修建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的大厦,其任务是艰巨的,繁杂的。1950年6月,在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明确地将课程改革作为建设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最初着眼点,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便从这里起步。《决定》指出:“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编订为新中国高等学校所适用的教材,是实行课程改革的重要条件。因此,建议在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领导下,成立高等学校教材编审委员会,……有计划有步骤地编译各项适用的教材和参考书。”这是新中国最早关于教材建设工作的论述,第一次明确了教材建设工作在整个教育事业、教育改革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拉开了新中国教材建设工作的序幕。

纵观建国以来的文科教材建设工作,大致可以“文革”十年为界分为两个时期,“文革”前十七年主要解决“从无到有”的问题,“文革”以后,则在继续补缺的基础上着手解决“从有到优”的问题”。

1951年3月,教育部筹组了由各校专家学者参加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审委员会,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不可能立即编出适用的教材,实际上,从1951年至1954年,教育部围绕着课程改革组织力量翻译了一批苏联的教学大纲和教材,特别是1952年全国规模的院系调整之后,各高等学校普遍学习苏联经验,进行教学改革,翻译使用了大量的苏联教材。据不完全

统计,仅中国人民大学1951——1954年3年内就翻译苏联教材150余种。对这批翻译教材,教育部曾在1952年颁发的《关于翻译苏联高等学校教材的暂行规定》中强调:“采用苏联教学大纲和教材,应力求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应在不破坏学科系统性的原则下,加以适当精简或压缩。”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这批苏联教材在教育大变革时期的确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然而,仅采用翻译教材,既不能满足教学的需要,更不利于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教材必须自编,特别是文科教材,自编才是唯一的出路。教育部1954年制订的《全国综合大学语文及历史课程教材编译办法》正体现了这一思想。《办法》强调教材要自编,提出先编教学大纲,后编教材的步骤,并对自编教材的内容和形式提出一定的要求。同时列有汉语言文学、历史学等学科31门课程的教学大纲及教材、参考资料的编选计划。到1956年底已完成了18种教学大纲的编写工作,并确定了9种教科书的编选方案。尽管指导思想方面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思考和完善,这一工作未能继续,但可以肯定地说,在这一阶段,文科教材建设工作的地位基本确立,教材与教学的关系基本摆正,对教材建设工作的认识问题已得到初步解决。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冲击着各条战线,教育战线也未能幸免。这在教材建设工作中表现尤为突出。当时,正象群众性大炼钢铁、创作诗歌运动一样,一些高校掀起一股群众性突击编书热潮,许多在校学生纷纷起来编写讲义和教材,我国文科教材建设工作从而进入一个貌似高潮的低谷时期。从注重调查研究和增强教材的适用性来讲,学生参加教材编选工作是可取的。但是,由于“左”的干扰,最初提倡的老中青“三结合”原则后来完全被抛开,片面地把群众路线理解为靠“人多势众”,总想“苦战几昼夜”就能编出好教材。据17所院校统计,仅一年内,文、史、哲等6个专业共编写出版了38门课程的154种教材。由于参加编书者理论和知识的不足,仓促上阵、急于求成,直接影响了所编教材的质量,100多种教材中真正经得起实践检验,适合教学需要,在教学中发挥作用的极少。这无疑是教材建设工作的一次失败。1959年5月教育部党组在中央批转的《关于高等学校学生自编讲义问题的意见》中指出,编写讲义主要是教师的责任,而不应把这个担子放在学生身上,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好规定的各种课程,时间、精力主要应用在学习功课上。这充分说明我们教育工作的决策者很快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是,文科教材建设工作真正走上正轨还是两年以后的事。

1961年4月,中宣部会同教育部、文化部在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会议在总结建国以来高等学校文科教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着手纠正过去工作中“左”的偏向,比较系统地规定了文科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针和教学计划,制订了224门课程所迫切需要的297种教材的编选计划。这是一次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会议,它贯彻了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总方针,完全符合中央后来颁发的《高教六十条》中“有计划地进行教材建设工作”的精神,特别是将教材建设纳入整个教育体系中统一规划和部署的做法,真正将教材建设工作的地位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实践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会议结束后,在周扬同志亲自主持下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办公室,本着集中编写和分散编写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组织全国老中年专家和优秀青年近300人,在京、沪两地集中编书,一方面鼓励各校自己编书。从此,文科教材建设工作开始了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自力更生、生机勃勃的新阶段,这一时期被一些专家誉为文科教材建设的“黄金时代”。

由全国一流专家学者所编写的一批高质量的教材,是这一阶段最突出的成果。当时在北京、上海集中编书的如王力、翦伯赞、蔡仪、朱光潜、任继愈、叶以群、游国恩、郭绍虞、艾思奇等,都是全国社会科学界一流的专家和学者,他们在较高的理论水平和扎实地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本着“观点正确、进步,材料充实,可靠,文字简明、生动”的原则,所编写的

教材,无论内容和形式方面均达到国家一流水平。截至1965年底,短短几年内,集中编选的教材共出版了70多种140多册,另有已完稿付印的24种33册。这是我国第一批由自己组织编写的文科教材。这批教材的产生,扭转了我国高等文科教育缺乏教材的状况,初步满足了教学的急需,对于稳定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有些教材至今仍在教学第一线充分发挥着作用。在1987年全国优秀教材评奖中,共评出全国文科优秀教材66种,其中60年代初编写的10种,占总数的15%,如王力的《古代汉语》、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等被评为全国优秀教材特等奖。有的教材在国际上也享有相当声誉,据有关方面统计,近些年来,在香港销售量最大的教科书就是内地60年代编写的这批教材。

文科教材的编选工作,为我国高等文科教育事业培养了一批中青年骨干。老中青相结合的口号早在1958年的教材建设工作中就提出来了,但由于“左”的干扰,这一口号并未真正付诸实施,实际上形成以青代老的状况。然而,60年代初的这次文科教材建设工作自始至终贯穿着这一原则。周扬同志曾强调:必须坚持党内外新老专家合作的原则,如何对待老专家,如何使青年和老专家团结合作,已成为一个关系到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学术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因此,我们既要注意调动老专家的积极性,同时也要继续发挥青年的作用;提倡青年要向老专家学其所长,老专家要关心青年,培养青年,彼此互相尊重,团结合作。正是由于这一思想得以顺利地贯彻,正是由于老专家的言传身教,数以百计的青年学者、教师迅速成长起来,成为我国文科教育事业中一支不可低估的生力军。到目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成为我国社会科学各有关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发挥着作用。

60年代这一阶段的文科教材编选工作,是一次开创性的工作,它在探索中前进,又在前进的过程中为以后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如在编选班子的组织方面强调主编负责制;在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方面强调处理好红与专、论与史、古与今、中与外、批判与继承、材料与观点、正面与反面等关系,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编写方法方面强调从调查研究、分析材料入手;就教材质量上也提出较全面的标准,所有这些,无论对文科教材建设工作本身,还是对整个高校文科的教学、科研及学科建设,都具有很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毋庸置疑,60年代初期的文科教材建设工作,在教育改革的浪潮中显现出蓬勃生机,为高校文科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创造了条件,闯出了路子,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但令人痛心的是,“文革”十年,致使这项工作陷于完全瘫痪状态,其损失是惨重的。

1976年底,尽管内乱基本结束,但全国的文科教育事业已处于崩溃的边缘。1977年,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主持下,文科教育事业得到了恢复,并开始了“文革”以来的第一届招生考试。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师资、经费、教材等等,似乎每个具体问题都具有举足轻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意义。究竟从何入手,邓小平同志1977年8月在《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中指出:“教育制度中有很多具体问题。……关键是教材。”教材是关键,这不单取决于教材在教育事业中的特殊地位,更由于新的历史时期对教材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文革”十年耽搁了整整几代人的正常学习,而刚恢复的高等学校的师资和教学条件只能使部分青年得到学习的机会,而更多的青年则只有通过自学和夜大、电大等途径得以深造,因此,编选出版一批好的教材,意义尤为重大;其次,由于十年内乱使得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被歪曲、历史事实被篡改,使得我们对国外的东西不敢借鉴,自己的实践经验教训不能正确总结,片面强调观点,忽视材料,强调“科学的逻辑”,忽视读者对象,等等,所有这些都说明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重新编写我们的教科书

的任务显得更加迫切和重要。

为了尽快恢复我国的文科教材建设工作,教育部根据中央领导的指示,在1978年6月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工作座谈会上,充分肯定了1961年至1965年的文科教材建设工作,并确定了在新的历史时期编写新教材的原则,指出这一阶段文科教材建设的指导思想应是“先有后好”。会上共制订了汉语言文学、历史学、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和图书馆学6个专业200余种教材的编选计划,其中一部分是重新修订60年代初出版的质量较高的教材。1981年底,教育部又组织编选了汉语言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专业教材60余种。

为了适应文科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从根本上解决教材问题,教育部决定重新设立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办公室,专司高校文科教材的组织编审和出版工作。文科教材办公室成立以后,在两年多调查研究、多方面征求各个学科专业的专家学者意见的基础上,制订了中文、历史、哲学、经济、教育与心理、新闻、政治、法律、图书档案和社会学10个学科的教材编选计划,共计编选项目(包括教学参考书和译著)87种。各学科专业的教材编选计划中,基本上都含有论、史、选、具(工具书)四部分,并配有部分翻译教材,使之“成龙配套”。特别是对那些在学术界有着不同观点、学派的学科专业,力求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计划内教材项目,有些已经出版发行,有的仍在编写中。此外,为调动广大教师编写教材的积极性,促进教材建设工作,1984年前后,在教育部的支持和协助下,我国许多高等院校建立了出版社,这些出版社除承担教材编选计划内教材的出版发行工作外,主要帮助本校和本地区教师出版较成熟的讲义、教材和专著,这些出版社的成立,既调动了广大教师编写教材的积极性,同时,使我国教材出版难的状况得到缓解。截至1985年底,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各高校出版的各类文科教材已达1650多种。总之,目前我国文科教材建设事业已经从主要解决“从无到有”逐步向解决“从有到优”过渡。

38年来的文科教材建设工作,经历了几起几落的大波折,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实践雄辩地证明:没有一个正常的政治环境、正确的指导方针;没有得力的编选队伍、科学的工作方法以及有效的工作措施,文科教材建设事业的发展将成为一句空话。

由于历史与现实、主观与客观各方面的因素所致,我国的文科教材建设工作中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与不足,例如教材质量普遍不高;编写工作过于偏重老学科忽视新学科,重“史”轻“论”;翻译教材和教学参考书偏少;教材建设管理工作与新时期的要求不相适应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应引起我们重视。

未 来 的 构 想

通过对我国文科教材建设工作历史的回顾,我们一方面看到了文科教材在培养整整几代社会科学人才过程中起到的巨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又看到了其中的问题和不足。为了搞好未来的文科教材建设工作,就必须借鉴历史,正视现实,不断改革完善。

首先,应确立新的“教材”观念。长期以来,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教材就是课本,就是学生在校学习的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如果只作狭义的理解,这样的观念是无可厚非的,但在科学技术不断深入发展,知识“爆炸”现象日趋激烈的今天,单从狭义的角度理解教材显然是不够的,要适应未来,就必须确立新的思想观念,“教材”应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如果要下一个抽象的定义的话,那么,教材就是“供教学用的各种形式的信息载体”,包括文字、音响和形象等各种形式。从这样的定义出发,未来的文科教材,不但应包括用文字表述的论、史、

选、具,还应包括以音响、形象表现的各种录音带、幻灯片、录像片、电影和各种艺术作品等。就以美学为例,新的意义上的教材,不但应有“美学原理”、“美学史”(中、外)“美学资料选”、“美学经典著作注释”,还应有“中外美学家评传”、“美学断代史”、文学艺术作品、电视、电影、幻灯片等。

教材观念之所以要更新,是教育事业发展的要求。新形势下的教育,要求我们必须实行“立体式”、“全方位”的教育方式和“研究式”、“讨论式”、“启发式”等新的教学方法。新教学方法的实施,必须借助于大量的可供学生翻阅的教材、教学参考书、专著、译著以及电视电影、艺术作品等为基础,没有这样一个坚实的基础,教师可“启”,但学生未必能“发”。而且更重要的是,新的教育方式的实施不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它涉及到知识的内容、广深度及其结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都要通过教材得以实现。

其次,文科教材建设工作的重点应逐步向“从有到优”迈进。这里所说的“优”,就是指我们将来编选的文科教材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能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本学科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必须有较强的理论性、科学性和系统性,内容丰富,材料准确;还必须做到文字精炼,语言生动,深入浅出,条理分明。这是一项重大的时代使命和社会责任,要完成这个任务,第一,必须继承历史遗产;第二,必须借鉴外国文化;第三,必须总结我们自己的实践经验。三条缺一不可。

在过去出版的各类文科教材中,由于历史的原因,除原教育部组织编写的一部分主要教材外,其他大多数的教材和教学参考书,质量都有待提高,有些教材的编写者缺乏扎实的研究基础,甚至有互相抄袭现象。此外,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不少教材在科学性、准确性、时代感及实用性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憾和不足之处。

我们认为,文科教材要实现“从有到优”最主要的是必须从整体上重视文科教育,注重文科教育中教学、教材和科研的结合,特别是参加编写教材的教师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养,必须做深入扎实的研究工作,不要急于下结论,更不能东拼西凑;强调编者深入教学实践,积累教学经验,加深各种感性认识;另一方面,编者必须加强教学理论的修养,把教学理论和教材建设结合起来研究,做到既懂教学理论又具有深广的学科专业知识,此外,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更是使文科教材实现“从有到优”的关键。总之,文科教材质量的提高,须通过我们从上到下的共同努力,并加以“综合治理”,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再次,加强文科教材的“引进”和“输出”工作。这几年来,我国在翻译外国学术著作、优秀文科教材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这仅仅是个起步,与日益发展着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实际需求相比,还相距甚远。以原教育部制订的《一九八五年——一九九〇年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为例,在10大学科870多种教材项目中,翻译教材和教学参考书只有53种,仅占总数的6.3%。因此,在未来的文科教材建设中,必须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加强教材的“引进”工作。我们计划引进的教材,应是具有国际水平或反映不同流派、观点的。并要特别强调对苏联等东欧国家教材的引进,这些国家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教育制度等与我国十分相似,其教材的参考借鉴价值更大。在教材引进过程中,还应大量地翻印一批教学参考书,这将更有益处。

同时,为了使世界各国人民更全面地了解我国的历史与现状以及我国文科教育事业的实绩,为全人类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我们还必须加强文科教材的“输出”工作,让我国的优秀文科教材走向世界。由于种种原因,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充斥世界讲坛书市的绝大部分汉语语言书籍和教材,均源自台湾,许多国家在研究、评价我国的人文科学及文教事业时,

大都以台湾的出版物为基础,把台湾的“水平”,看成是整个中国的水平,这样一来,他们社会对新中国的文化产生一些偏颇甚至是错误的理解和认识,对我国人文科学方面取得的成就缺乏全面准确的了解。

“输出”教材的渠道很多,我们既可以通过与世界各国的一些大学建立横向联系,互换教材,还可以通过与国外的出版商互相合作,联合出版我国的优秀教材、教学参考书,也可以由国家直接出面在国外建立图书教材销售网络,全面地“输出”我们的优秀教材、教学参考书。最近,国家教育委员会正式成立了“全国图书教材进出口公司”,其目的就是为了加强教材的“引进”和“输出”工作。

最后,加强宏观管理并建立教材的评奖制度。

通观文科教材建设工作的历史,也可以看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主要是由国家直接组织力量编写的。历来有“统编教材”的称谓,似乎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学校上课都必须以“统编教材”为标准教材。当然,这些“统编教材”不但符合教材规范,而且水平也较高,但在“教育事业日益深入发展,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不断涌现的今天,单靠国家组织力量来统编”文科教材似乎已成为不可能。因此,国家必须改革以往对文科教材的“细致入微”的管理方式,变微观管理为宏观管理。鼓励各地方,各院校自己编写具有自己特色,不同观点、风格和不同层次的文科教材。加强宏观管理一方面要简政放权,克服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工作作风,另一方面又要采取相应的辅助措施,以提高管理质量。建立文科的学科委员会和建立健全文科教材的评奖制度,可以说这是实施宏观管理所不可缺少的重要辅助措施。

要建立教材评奖制度,首先应解决认识上的问题。长期以来,自然科学研究有“科研成果奖”,社会科学研究有“优秀专著(论文)奖”,电影有“百花奖”“金鸡奖”,体育有“金牌奖”,等等,名目繁多,不可胜数,可唯独没有一个“优秀教材奖”。文科教材既是教学经验的总结,又是各门学科知识的结晶,它既体现了时代意识,又标志着国家的文化发展水平;教材不一定是专著,但它是在科研专著的基础上编写成的(当然,有的教材本身就是专著),从一定意义上讲,编写教材要比撰写专著更繁杂,更艰辛,一部好的教材,其社会效果同样不亚于一本学术专著。因此,设立“优秀教材奖”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认为,从中央到地方乃至各院校,都必须建立优秀教材的评奖制度,并且要定期进行评奖。由于文科教材的科学性、先进性、适用性不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所能确定的,因此,文科教材的评奖活动为期可以略长一些,可两年或三四年评一次,但必须定期评奖,形成制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调动起广大教师编写教材的积极性,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文科教材的质量经过“优胜劣汰”的筛选而不断提高,使我国的文科教材建设事业在这一竞争机制中得到充分发展。

1987年10月,国家教育委员会在重庆召开了第一次优秀教材评奖会议,会上共评出文科优秀教材126种;1987年12月,由国家教育委员会牵头,在京召开了“全国优秀教材评审会议”,共评出国家级文科优秀教材66种(其中特等奖7种)。这次优秀教材评奖活动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只要坚持下去,并使之制度化,我国的文科教材建设事业就一定会更加兴旺发达起来。